

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背景下 學術期刊生存方式的轉變

羅 驥

[提 要]我國從 2003 年開始正式實施的文化體制改革，對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關於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的出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改革的實施只是時間和範圍的問題。改革將使學術期刊從事業單位轉變為不完全企業，從單一刊物轉變為集團刊群，從單一資金來源轉變為多元來源，從行政監管主導轉變為市場監管主導。生存方式轉變中可以確定的結果是學術期刊集中度不斷提高，總體辦刊水平將提高，資金來源多元化將會實現；最大的不確定性是在轉企改制後原有人員身份的確定問題。

[關鍵詞]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 學術期刊 轉企改制 生存方式 身份

[中圖分類號] C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3) 01 - 0131 - 08

一、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實施的可能性

2012 年 7 月 30 日，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出臺《關於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辦法》主要內容是：除少數代表國家水平的學術期刊外，將主體為科研部門（主要是社科院和社科聯）和高校主辦學術期刊編輯部的全國非時政類報刊編輯部轉企改制為報刊出版集團，或由其他出版企業兼併，或註銷辦刊資格。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解放和發展報刊生產力，破解報刊業“小、散、濫”的結構性弊端，實現報刊業轉型和升級，推動報刊業又好又快發展，增強報刊出版傳播能力。《辦法》出臺後，由於其一舉顛覆了長期以來形成的報刊編輯部的“事業”、“公益”身份性質以及生存方式，所以在報刊界，尤其是學術期刊界引起了很大反響，對其原則和具體方法頗多爭議，尤其對其實施的可行性和前景更有懷疑。

在此，我們暫不研究該項改革設計是否有據，目標是否合理，實施是否可行，而只討論其付諸實施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推行的決心究竟有多大，會不會真的實施？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對此項改革出臺的背景進行考察。近年來與此直接相關的重大事件大致有兩個：一個是期刊界關於高校學報現狀與出路的討論，一個是國家的文化體制改革。

（一）期刊界關於高校學報現狀與出路的討論

一般認為，期刊界關於高校學報現狀與出路的討論開始於 2007 年。在是年 10 月 20 日舉辦的“首屆高校學術期刊發展論壇暨《中國政法大學學報》首發式”上，有專家提出“高校學報垃圾論”的觀點，認為多數高校學報已成為學術垃圾的生產地。這個觀點引起與會者的共鳴；同年 10 月 30 日中新網—《科學時報》為此刊發了新聞報導《高校學報已成學術垃圾產生地 專家：應追求獨立性》，也引起讀者很大的反響。此後，業內多方就此命題展開討論，其中，朱劍、仲偉民、姚申和尹玉吉等漸成代表性的人物，討論的主要陣地為《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隨著討論的深入，高校學報癥結及其改革的思路也漸次清晰。2010 年朱劍撰文指出，要革除高校學報“全、散、小、弱”的弊端，須實現從綜合性向專業化期刊的轉型，並以提高刊物的集中度和數字化出版作為其發展的路徑。^①2011 年，討論陡然升級。這年 3 月 21 日至 4 月 2 日，《光明日報》理論版開闢專欄“高校學報出路何在”，對高校學報的現狀和出路進行集中而連續的討論，其規模和強度空前。討論亦即欄目幾乎一邊倒的觀點是：高校學報現狀堪憂；高校學報必須儘快改革；要以“專、特、大、強”革除“全、散、小、弱”。緊接著，《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4 期同時發表朱劍和尹玉吉兩篇針鋒相對的文章^②，雙方觀點產生了激烈的碰撞。尹文堅守高校學報的現有理念和做法，反對所謂的特色化辦刊、專業化辦刊、合作數字化辦刊。朱文則對尹的論點和方法進行了犀利的反駁。

由於關於高校學報現狀與出路的討論與《辦法》的出臺時間大致能夠銜接，討論的內容與《辦法》的內容也有相似之處，於是有人認為，討論產生極大影響並得到領導層的贊同，是《辦法》出臺的主要推力和原因。如果《辦法》出臺的動力和原因真的是主要由於業內推動、上層贊同的話，那此項改革就存在很大程度的低層性、偶然性和孤立性，不確定因素太多，實施的決心和動力都是很令人懷疑的。

但是，種種跡象表明，討論對《辦法》的出臺並沒有產生重大的影響，更不用說決定性的影響，因為二者在諸多方面相去甚遠：第一，在核心內容上，《辦法》是將報刊編輯部“轉企改制”，這在討論中未涉及到，連最激進的改革論者都未提到。事實上，對簡單化的“轉企改制”，討論中的改革論者一方深感意外，並不贊成。^③第二，在範圍上，《辦法》幾乎將所有期刊一刀切，全部納入轉企改制的範圍；而討論只涉及高校學報，甚至是限定在高校文科學報。討論一般認為或默認社科院系統學術期刊並不存在高校學報所存在的那些弊端。第三，在上層態度上，《辦法》是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出臺的，而討論除《光明日報》外，更高級別的官方傳媒似乎並未捲入。第四，在時間銜接上，《辦法》的出臺係早在 2003 年就正式開始的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的自然延伸，而討論晚自 2007 年才開始。

（二）國家關於文化體制的改革

從更大尺度的空間和時間維度來考察此項改革出臺的背景和歷程，也許有利於我們對上述問題作更加準確的把握。

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和中共十四大召開，標誌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方向的確認，這為我國各項改革，包括文化體制改革奠定了制度基礎。2000 年 10 月，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文件正式提出了“文化產業”概念，為文化體制改革的市場化取向埋下了伏筆，預設了方向。2001 年，中共中央轉發中宣部、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關於深化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改革的若干意見》，對文化體制改革作了一系列探索。2002 年中共十六大以後，我國文化體制改革步伐明顯

加快。2003年是我國文化體制改革極具里程碑意義的一年，這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對文化產業的改革方向和目標作了明確的闡述：創新體制，轉換機制，面向市場，壯大實力。第一次提出文化體制改革的市場化方向和做大大做强文化產業建立一批大型文化企業集團。至此文化體制改革的基本原則和思路定型，並堅持到今。這一年成為里程碑更重要的依據是，改革不再僅僅是一種思想、一種理念，而是進入強力實踐的進程。這年6月，中央召開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會議，專門研究部署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全國9個省市，35個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文藝院團單位參加試點。在首批試點成功的基礎上，2006年初，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同年3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工作會議，決定擴大試點，全國89個地區、170個單位參加試點。到2010年底，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工作進展順利，以出版類為例，除少數公益性出版社外，幾乎所有出版社（包括高校出版社）都實現了改制轉企。2011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於深化非時政類報刊出版單位體制改革的意見》，對被稱為文化體制改革中“最後堡壘”的非時政類報刊編輯部的改革進行部署安排，“意見”對其中難度尤大的“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主管主辦的非獨立法人的學術期刊編輯部，另行制定具體改革方法”。2012年下半年，獨立法人的非時政類報刊編輯部轉企改制大部完成或正在收尾，7月底，主要針對學術刊物編輯部的《關於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就應聲落地了。

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屆六次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實際上是對此前的文化體制改革的理論和實踐做出肯定和總結，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

從上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一是文化體制改革對《辦法》的出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第二是學術刊物編輯部的體制改革不是一個孤立事件、權宜之計，而是一個高層支持、時空跨度廣大、目的明確、思路清晰、步驟協調、銜接緊致的宏大改革計劃及其實施的重要一環，具有高度的方向性和確定性，再考慮到前段改革舉措之果決、進程之順利，筆者認為，儘管仍有可能對改革方案做出一些局部調整，如增加一些不予改制的學術期刊（尤其是高校學術期刊），或推遲實施的時間，但如無重大變故，此項改革的原則已定、方向已定，剩下的僅僅是時間和範圍的問題。

二、學術期刊生存方式轉變的主要內容

如果此項改革行將實施不成其為問題，我們就要分析改革實施後學術期刊的生存方式將會發生哪些轉變，並在此基礎上考慮應對之策，以有利於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轉企改制後，學術期刊的生存方式當會有以下變化：

（一）身份性質：從事業單位轉變為不完全企業

此項改革的直接目標是“轉企改制”，即將本來是事業性質的學術期刊編輯部轉為企業，改變其運行機制和發展方式。學術期刊編輯部轉企後雖然名義上是企業，形式上也可以建立起法人治理結構，但是就企業的5個特徵組織性、經濟性、商品性、營利性、獨立性來說，轉企後的學術期刊編輯部大致能做到組織性、獨立性，經濟性也勉強可以，不過能否做到企業核心特徵的商品性和營利性就大有疑問了。無論是轉企前還是轉企後，學術期刊的版面可能都是編輯部唯一可以獲取經濟利益的資源，但是，版面能否作為商品卻是十分有疑問的，至少迄今為止無人公開認定其為商品。即便以後情況有所鬆動，版面能否作為商品仍是一個問題。商品的充分產銷對企業

至關重要，與企業的發展成正比，對企業十分有益；而經驗證明，版面費的產銷通常與刊物的質量和聲望成反比，因而對企業是有害的。可見，版面不具有商品的本質屬性，因而不能當作真正的商品。企業的本質特徵在於以盈利為目的，但學術期刊沒有一個明確的盈利模式，更不用說一個穩定和核心的盈利模式，因而盈利能力更無從談起。沒有商品性和營利性，轉企學術期刊編輯部當然不能視為完全的企業。這也是《辦法》遭受反對者甚至原本是改革擁護者詰難的主要問題。轉企學術期刊編輯部這種不完全企業的狀態將會持續很長的時間，在這漫長的時間裡，這種不明不白的身份對於轉企學術期刊編輯部來說是非常尷尬的。

從理論上說，轉企學術期刊編輯部經過一段過渡時期，會培育出自己的盈利模式並不斷增強盈利能力，發展成為真正的企業、甚至是強大的企業。但首先這個過渡期是很漫長的；其次很多學術期刊編輯部是等不到這一天到來的，要麼他們已經由於各種原因退出行業，要麼已經被兼併。

從長遠來看，作為轉企學術期刊編輯部的經營者，當然要設法縮短從不完全企業到真正企業的過渡期，以在競爭中處於有利地位。從短期來看，轉企學術期刊不完全企業特點也有其可利用的好處：一方面企業具有管理優勢和較大的自主權，有利於治理；另一方面殘存的事業單位性質，又為爭取各種渠道的資助提供了理由。

（二）體量內涵：從單一刊物轉變為集團刊群

長期以來，學術期刊編輯部基本上都是以刊物為單位存在；主辦單位同時舉辦若干刊物也多是如此，即便在形式上以一個行政部門來管理這些刊物，實際上也往往各自為政，互不相干。刊物人數很少，一般都在十人以下，甚至三兩人而已。由於體量小且不屬單位（尤其是高校）主體系列，往往不受重視，被邊緣化。

按照《辦法》規定，通過轉企改制這個突變，基本消滅單一學術期刊編輯部，學術期刊都以“集團”的形式和內涵存在，從而初步達到解決學術期刊“小、散、濫”弊端的目的，隨後，主事者當會創造條件，鼓勵兼併，鼓勵資本介入，從而使學術期刊集團不斷做大。從單一的刊物到企業集團至少會造成以下兩個變化：

1. 管理的多層化、複雜化和大型化

現行《公司法》並沒有“企業集團”之說，但企業集團在實踐中並不少見。一般認為，企業集團是指具有一定規模的企業法人聯合體，其本身不具有企業法人資格。可見，學術期刊出版集團中各個期刊都應是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企業，集團本身是否具有法人資格目前不得而知，但作為若干期刊的上層管理組織是沒有問題的。企業的管理客體既有作為底層的法人企業，也有作為上層的協調控制組織以及二者關係，還要加上可能的衍生組織，這樣就造成了學術期刊管理從單層化、簡單化和小型化向多層化、複雜化和大型化轉變，隨著兼併的進行，集團不斷膨脹，這種管理的多層化和複雜化的程度會越來越高。當然，也不排除集團只是形式，各個刊物仍然各自為政的情況，不過主事者會通過相關政策和行政管理來避免這種情況的存在，而且隨著市場化的推進，利益驅動也使這種情況成為不可能。

2. 刊物資源的豐富化和結構的合理化

隨著體量內涵的轉變，學術期刊出版集團的刊號資源從單一種類轉變為至少有3個刊物的刊物集群，隨著兼併的進行，集團的刊號資源將會更豐富。目前，學術刊物的學科類別結構很不合理，綜合性期刊比例太大。張耀銘就曾經指出：“學術期刊，尤其是拼盤式的綜合性期刊，‘趨同化’現象非常嚴重。中國高等院校文科學報有千餘家，綜合類的期刊就佔了三分之二。”^④以前，

辦刊者缺乏改變此現狀的動力和條件，轉企改制後，資源的豐富和企業的性質使改革變為可能和必然。為滿足市場的細分需求，爭奪作者和讀者，除少數綜合性期刊外，多數刊物將會按學科、學科方向甚至學術問題改為專業性期刊。如英國《自然》出版集團旗下除著名的綜合性自然科學週刊《自然》外，另擁有至少 8 種的專業性月刊，其中生物學科佔優。^⑤另外，為追求經營效益的最大化，可能突破學術期刊傳統的領域，舉辦針對不同受眾的、與學術期刊學科相關的科普類期刊，甚至可能涉足報紙。這類報紙如辦得成功，不但能與其學術期刊相得益彰，在學術上形成深淺、快慢、詳略等不同層面上的良好配合，而且能成為集團廣告經營的一個重要平臺。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目前是六刊一報的格局，其《中國社會科學報》影響力日益提升，如轉企改制，雜誌社肯定會加強對報紙的投入和運作以對雜誌社有更大的貢獻。

集團的經營者要儘快適應以上變化，實行分層管理、企業家管理、專家辦刊；要特別加強頂層設計、協調發展、市場營銷等工作。以市場為導向，調整結構，合理配置刊號資源。

（三）資金來源：從單一資金來源轉變為多元來源

作為事業單位的學術期刊編輯部，其經費來源（包括人頭費和辦刊經費）通常明確而單一，即由主辦單位劃撥。這種經費的規模通常只能維持辦刊和部門工作的正常運轉，難以為其建設和發展進行重大投入。轉企改制後，獨立轉企的期刊，甚至併入其他出版企業的期刊並未與原主辦者剝離，由於期刊，尤其是獨立轉企的期刊與主辦者的關係並未發生實質性的轉變，學術期刊，尤其是優質期刊資源的緊缺性和對主辦者相關建設的重要性，主辦者大致能保持原有規模的經費投入，否則，會出現刊物難以為繼被別的出版集團兼併，從而失去這個重要資源的危險。但是，由於以下原因，這筆經費已經很難滿足集團的要求了：一是業內競爭日趨激烈，需要更多的投入；二是分配制度改革，需要更多的分配資金；三是至少新進人員人頭費由企業承擔，需要新增一筆不小的支出；四是企業需繳納各種費稅。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經營者承受尋求並實現資金來源多元化的巨大壓力。就中短期來說，除主辦單位劃撥以外，企業資金來源可能的渠道大致有以下幾種：

1. 爭取各種基金的資助

《辦法》承諾：“積極爭取國家各種基金對學術期刊的支持，將國家基礎學科和前沿學科的重點科技期刊和學術期刊納入國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出版基金資助範圍；積極爭取中央和地方財政通過安排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宣傳文化發展專項資金等渠道，對重點科技期刊和學術期刊出版單位予以扶持。”目前，影響較大的學術期刊基金資助項目有以下兩種：國家社科基金學術期刊資助；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學術期刊專項基金。前者從 2011 年開始，首批有 100 種期刊獲得資助，2012 年 4 月已進入第二批，每刊資助額為 40 萬元 / 年；後者從 1999 年開始，已資助 7 批，每批大約有 30 ~ 40 種期刊獲得資助，資助額度低於國家社科基金。以上兩類資助項目對刊物水平和影響力要求較高，一般刊物難以獲得。

2. 廣告費收入

長期以來，少數學術期刊或明或暗地利用刊物封頁或版面做廣告以獲取收益，但由於學術期刊本身通常發行量小，受眾有限而且狹窄，其廣告效益非常有限，加以獲得並維持廣告業務資格的管理成本較高，所以此項業務很少開展。儘管如此，此項業務仍有其一定空間，其大小與營銷力度有直接關係。轉企改制後，經營者當會重視並加強這項業務。隨著刊物質量與影響力的不斷提升和企業不斷做大做強，刊物廣告業務將有所改善，收入有所增加，在企業總收入中比例不斷

提高，甚至有可能成為主要收入來源。典型的例子是美國《科學》雜誌，其年廣告費收入達 2,000 萬美元，佔其總收入的一半。^⑥

3. 版面費收入

迄今為止，學術期刊收取或多或少的版面費是業內公開的秘密，雖然在道德層面的壓力很大，但政府管理部門對此採取默認的態度，除非事情發展到某種極端的地步。版面費成為監管上的一個灰色地帶。轉企改制後，基於企業的性質和實際，版面費可能會浮出水面，甚至獲得合法的地位。如版面費合法，其空間還是比較大的，有消息稱，國外學術期刊版面費標準有達 300 美元 / 頁的^⑦，如此則一篇 10 頁的文章可收版面費 2 萬元人民幣。但是企業可能不會肆無忌憚地收取版面費，除非是以死相搏；企業會在現實經濟利益與長遠利益之間尋求一種平衡，極端的甚至會以不收版面費來提升自己的美譽度，使其在競爭中處於有利地位以獲得更大的利益。

4. 刊物訂費收入

長期以來，學術期刊的發行量很少，很多就在千餘份以內；定價低，很多不超過 10 元 / 份。發行類型主要是交換和贈送，只有很少一部分有訂費收入。所以，訂費收入少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轉企改制後，如果刊物做大做強到一定程度，再加以積極的營銷，刊物訂費收入可能會有所突破。仍以美國《科學》雜誌為例，其發行量高達 16.5 萬份，訂費收入高達 1,500 萬美元。^⑧有消息稱，國外有的學術期刊的年訂費甚至可以達到 13 萬美元 / 份。^⑨當然，這樣的刊物應已形成學術信息數據的壟斷地位並且沒有二次文獻出版的干擾，擁有強大的單獨定價能力。

5. 版權經營收入

一段時期以來，多數學術期刊編輯部事實上都在進行版權經營活動並有所收入，如參加中國知網、萬方數據等大型學術論文文獻數據庫並獲得相應的數據費。但由於雙方資源、影響、地位嚴重不對稱，學術期刊編輯部在合作中獲得的利益很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有消息稱，某大型數據庫通過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價格獲取學術期刊刊發論文的數據並進行深加工轉手出售，獲利驚人，估計年收入高達 20 億元。^⑩通過轉企改制後，隨著體量、實力的持續增大和市場意識的增強，學術期刊出版集團或者是集團聯合體可以在與這些數據服務平臺公司的博弈中處於更有利的地位，從而獲得更多的收益。而有消息稱，有的大型數據庫已開始按刊物的資質和影響力來分等級給付學術期刊數據費，最多達到數十萬元 / 年。^⑪

除以上類型外，其他來源還包括諮詢費、合作費等。

企業做大做強以後，資金來源亦即盈利模式將會明顯擴大，如有償數據庫、經營性網站、盈利性學術活動等。

對於企業經營者來說，資金來源多元化工作近短期的重點是在社會上通過有效的運作，獲得更多資助；中長期的重點是在市場中提升企業自身的盈利能力並形成核心競爭力，而這些工作的前提是提高刊物的水平和影響力。

（四）政府監管：從行政主導轉變為市場主導

目前，作為代表政府對學術期刊進行管理的主體只有新聞出版部門，轉企改制後，由於組織身份的根本性改變，學術期刊從事業公益主體轉變為市場主體，其政府管理主體也增加了作為市場管理主體的工商、稅務、勞動等部門。同時，新聞出版部門也會向市場型管理轉變，如制定相關產業政策，提供有利於改善市場環境的政策，建立相關的市場准入與退出機制，等等。例如，對當時文化體制改革提供諸多優惠政策的國務院辦公廳 2008 年 10 月印發的《文化體制改革中經

營性文化單位轉制為企業的規定》和《文化體制改革中支持文化企業發展的規定》兩個文件，就是新聞出版總署參與制定的。一些傳統的監管內容如敏感的政治和民族問題、從業人員資格、刊物年檢等將會保持，但其中一些將會逐漸弱化，一些將由社會中介組織來組織實施。

學術期刊出版集團要注意努力適應新的管理部門、管理內容和管理方式，同時也要注意適應並利用主管部門出臺的各種有利政策來發展自己。

三、學術期刊生存方式轉變中的確定性和不確定性

學術期刊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背景下的學術期刊生存方式的轉變及其後果，有的是確定的；但由於信息的不對稱或者是相關具體政策仍在制定當中，有的仍是不確定的。

(一) 確定性

以下生存方式轉變及其後果是確定的：

1. 學術期刊的集中度不斷提高，“小、散、濫”弊端將被破解。轉企改制後，由於大量未達繼續辦刊條件的期刊需要併入期刊出版集團或其他出版企業，學術期刊集中度亦即單位出版機構旗下期刊數量將在短期內猛增，並在今後很長時期繼續增加。據統計，目前學術期刊的集中度大約為 2.0，^⑨估計很快將達到 5.0 以上。結果是，小的學術期刊編輯部將不復存在，主事者樂於看到單一學術期刊編輯部乃至弱小的學術期刊集團的消失；刊號將越來越集中在數量有限的出版機構中；到處都辦學術期刊的情景將被消除。在這個過程中，學術期刊的存量總數將不會明顯減少，因為總的來說，目前刊號資源還是供不應求，甚至還會出現越瀕於退市的刊號越搶手的情景，就像 ST 股一樣。這樣，當事者能比較容易地破解學術期刊“小、散、濫”的結構性弊端，從而使改革至少取得部分成功。

2. 學術期刊總體辦刊質量將會提高。由於學術期刊由不具有或不太具有辦刊條件的機構集中到辦刊條件較好的機構舉辦，從理論上說，如不考慮其他因素，學術期刊的總體辦刊質量將會提高。

3. 學術期刊學科結構趨於合理。由於學術期刊集中度的提高，辦刊者將不得不增加專業性期刊以避免同質內部競爭；由於細分市場、爭奪作者和讀者，以佔領最大市場份額的經營理念的推動，辦刊者也需要舉辦更多的專業性期刊。這些都使學術期刊的學科結構更趨合理。

4. 學術期刊出版集團資金來源多元化將會實現。經過轉企改制後仍能生存的學術期刊，其主辦單位有動力、有能力提供人頭費和基本辦刊經費，除非集團的財務狀況已健康到可以不提供這筆經費；刊物能輕而易舉地收取一定標準的版面費；大型學術文獻數據庫將會提高付給學術期刊的版權使用費。以上構成了經費來源多樣化的基礎。基於此，集團至少能保證維持辦刊的基本支出，不至於出現目前有人擔憂的刊不聊生的境況。

(二) 不確定性

學術期刊生存方式轉變中最大的不確定性是學術期刊轉企改制後原有人員的身份問題。學術期刊轉企改制後，期刊編輯部的身份無疑是企業法人，但原有人員究竟是事業編制還是企業編制，就現有的信息而言，是非常不清晰的，而學術期刊原有人員的身份確定是影響此項改革最重要的變數。據分析，學術期刊轉企改制後原有人員身份的確定大致有以下幾種可能：

1. 全部轉為企業編制。目前學報編輯部的編輯，包括管理人員，多數都是高學歷、高職稱專業技術人員，其中不少還是有成就的學科專家。如果計劃將他們轉為企業編制，在改革實施以前，

這支隊伍勢必就會散掉。如果出現這樣的情況，全國學術期刊多數將癱瘓，難以運轉。這種方式的破壞性太大，以前的改革還未見有其先例。

2. 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所謂“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就是原有人員原有身份不變，待遇不變；新進人員為企業編制。這個方法承認並維護原有人員的既得利益，以減少轉企改制的阻力，使其易於成功，還能保證原有隊伍，尤其是編輯隊伍不散，有利於刊物的生存和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很多成功的改革都使用了這種方法；而文化體制改革中出版單位的體制改革也使用這種方法。

3. 編、企分離，編輯隊伍納入主辦機構的科研機構。這種辦法是不讓編輯人員進入學術期刊出版集團，而是進入主辦機構的科研實體部門，其事業編制身份自然得以保留；進入集團的均為經營性人員，其身份是企業編制，如為“老人”則退休後又恢復事業編制身份。集團與主辦機構的科研實體之間的關係是前者委託後者策劃組稿、編稿的關係。這種方法具有一定創新性。《辦法》中對暫不轉企改制的學術期刊要求“建立由科研部門分別編輯、出版企業統一出版發行的運行模式，依託大型新聞出版傳媒集團公司搭建學術出版經營平臺”。其說法頗具深意，與上述辦法有相通之處，實際上也可作為轉企改制後原有人員身份確定的一種思路。在西方發達國家學術期刊辦刊中，像這樣的委託編輯制是學術期刊辦刊的一種通行的方法，我們可以予以借鑒。

根據歷史和現實的情況來看，轉企改制中按第二種方法確定原有人員身份的可能性比較大；也不排除第三種方法；第一種方法的可能性則很小，相信除非出於不得已，當事者或不會出此下策。

①朱劍：《高校學報專業化轉型與集約化、數字化發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設為中心》，北京：《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

②尹玉吉：《論中國大學學報現狀與改革切入點》，朱劍：《也談社科學報的現狀與改革切入點》，北京：《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

③見仲偉民、朱劍：《中國高校學報傳統析論——兼論高校學報體制改革的目標與路徑》；夏文：《學術期刊編輯部體制改革“實施辦法”之理性解讀》；陳穎：《編輯部體制的終結與“後學報時代”的來臨？》，北京：《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

④張耀銘：《中國學術期刊的發展現狀與需要解決的問題》，北京：《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

⑤見英國《自然》雜誌官方中文網站介紹，www.natureasia.com

natureasia.com

⑥⑧王應寬：《美國〈科學〉雜誌的成功經驗及對中國科技學術期刊的啟示》，北京：《出版發行研究》，2004年第12期。

⑦⑨⑪據2012年11月全國高校文科學報第七次代表大會學術研討會交流信息。

⑩據2012年11月全國高校文科學報第七次代表大會學術研討會交流信息及趙楓嶽《我國學術期刊發展困境成因研究》（太原：《編輯之友》，2012年第2期）。

⑫趙楓嶽：《我國學術期刊發展困境成因研究》，太原：《編輯之友》，2012年第2期。

作者簡介：羅驥，雲南師範大學教授，《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編輯部主任、主編。昆明650223

[責任編輯 劉澤生]